

## 日本戰略文化與戰後日本安保政策

林賢參

清雲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 壹、前言

從國際政治學理論現實主義學派(*realism*)的觀點，是無法說明戰後迄今，日本為何堅持日美安保體制與「專守防衛」原則。因為，日本即使已經發展成為僅次於美國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雖然出現些許雜音，但依然沒有做出挾其雄厚的經濟力量以建構自主性國防力量，甚至追求成為軍事大國之戰略決定。1990年夏季以降，當日本面對其主要能源供應地波斯灣出現戰亂時，雖然包括同盟國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要求其扮演積極性的軍事角色，日本依然迴避此等要求，而採取非軍事措施的「支票外交」。因此，本文嘗試透過「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研究途徑，對於包括前述現象在內的戰後日本安保政策進行探討。

戰略文化影響國家安全政策之討論，已散見於中國古代兵書『孫子兵法』或者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羅奔尼薩戰史』等古典著作。第二次大戰結束以降，以戰略文化研究途徑，研究國際安全、國家安全或對外政策的趨勢，出現在1970年代。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或稱為「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的興起，讓戰略文化研究途徑逐漸精進，對充實國際政治研究與戰略研究有所裨益。具體而言，拜建構主義之賜，戰略研究學者開始分析戰略文化形成及其發展的過程，讓戰略文化被認定是分析國家行動或決策之獨立變數。此一觀點，即是本文之基本假設。

以下本文，首先針對戰略文化之定義及其根源，以及建構主義對戰略文化研究之影響，作一概要地說明後，將檢視影響近代日本傳統戰略文化之主要因素，以及戰後壓抑軍國主義復活所衍生出的「反軍國主義」(*anti-militarism*)、「和平主義」(*pacifism*)，對戰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走向之影響。

## 貳、 戰略文化研究與建構主義

### 戰略文化的定義

「戰略文化」一詞，是美國戰略研究學者史奈德(Jack L. Snyder)向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提出的報告中首度使用，以分析蘇聯核武準則(*doctrine*)所發展出之理論，預測克里姆林宮領導人接受有限核子戰爭的可能性。史奈德表示，國家菁英(戰略社群，*strategic community*)在安全與軍事等領域擁有獨特的戰略文化，而此等戰略文化是國民整體所共有的概念，並且以獨特的戰略思想發展而來，是關於核子武器之一般性思考、態度、以及行動模式等之總和，是達成文化層次的半永久狀態之概念。史奈德在結論中指出：「蘇聯紅軍具有喜好先發制人地使用軍事力量進行攻擊之傾向，此一傳統存在於俄羅斯國土防衛上之不穩定，以及長期專制統治的歷史過程中」。<sup>1</sup>

史奈德的研究，引起其他安全戰略研究學者的共鳴。例如，布斯(Ken Booth)在『戰略與種族中心主義』(*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著作中，持續針對存在於美蘇核武戰略與超級強權關係之觀念性基礎進行分析，並且稱：軍事戰略的形成是一種「獨特的種族中心事務」。其次，葛雷(Colin S. Gray)在『戰略的國家型態：以美國為例』(*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 The American Example*)著作中指出，擁有起源於獨特的歷史經驗之國家型態，決定類似美蘇兩國之戰略發展性格，因此，核武戰略與歷史的政治方向具有關連性。葛雷對於戰略文化則有如下之定義：「關於軍事力量之思考方式與行動的樣式，對於國家的歷史經驗之感受方式，或者是要採取作為國家負責任行動的願望」，「起源於大眾文化與生活方式」。因此，戰略文化「是提供討論戰略選項之環境」，扮演作為戰略政策型態之獨立決定性因素的角色。葛雷與史奈德之看法相同，他們認為戰略文化是對安全政策發揮半永久性影響的因素。<sup>2</sup>

此外，葛雷提出以下六項要點，以有助於理解戰略文化的本質與作用。第一，戰略行為不能超越文化；第二，逆境不能取消戰略文化，亦即戰略決策者會依據文化規則行動；第三，戰略文化是行動指導方針，不是實務操作手冊；第四，戰略文化表述比較優勢；第五，戰略文化可能會功能不正常；第六，戰略文化可以分類為各式各樣的範疇。<sup>3</sup>

---

<sup>1</sup> Jack L. Snyder,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The Rand Corporation (Sep. 1977), <http://www.rand.org/pubs/reports/2005/R2154.pdf>, 2010年5月1日登入。

<sup>2</sup> Jeffrey S. Lantis, Strategic Culture: From Clausewitz to Constructivism, *Strategic Insights*, Volume IV, Issue 10 (October 2005), <http://www.nps.edu/Academics/centers/ccc/publications/OnlineJournal/2005/Oct/lantisOct05.pdf>, 2010年5月4日登入。

<sup>3</sup> Colin S.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5, No.1 (Jan.1999), pp.49 - 69, <http://www.people.fas.harvard.edu/~johnston/gray.pdf>, 2010年5月1日登入。

在後續的研究中，布斯對戰略文化提出明確的概念，亦即：「一個國家關於武力威脅與武力行使的傳統、價值、態度、行為模式、符號、成就，以及適應環境與解決問題的特定方式與成就」。<sup>4</sup>另外，克廉(Yitzhak Klein)則認為：戰略文化是對於戰爭的政治目標，以及達成該目標最有效的戰略與執行方法，是一種社會傳承的習性、傳統、及依據地理環境的安全需求，所偏好的運籌帷幄方式。<sup>5</sup>其次，約翰史東(Alastair Iain Johnston)將戰略文化視為「一種統合的象徵系統(*integrated system of symbols*)，透過軍事力量在國家間政治事務之角色與效率的概念形成，以及賦予該等概念此等事實的氛圍，亦即戰略選擇偏好似乎是獨特的、實際可行的，而且是有效的，用以建立普及且永續存在的戰略選擇偏好」，「是一種限定行動選項的觀念環境」。約翰史東強調，作為「象徵系統」，戰略文化具有兩個核心架構的構成要素。其一，有關戰略環境規律的基本假設，它是一種關於戰爭中人類事務中之角色、敵人及其所具有的威脅性質、以及武力行使的效果等之假設；其二，最能有效處理前者所界定威脅環境之戰略選項，戰略文化在此部分開始直接影響國家戰略行為。<sup>6</sup>

不過，雖然有許多戰略學者相繼投入對戰略文化之研究，但是並未能歸納出一個對戰略文化之共同定義。基於此，本文乃根據以上各家之說，將戰略文化定義為：一種思想文化與戰略之結合，亦即戰略決策者進行戰略規劃時之文化背景，此一文化背景讓渠等在決定有關國家安全議題時，出現固定的習慣偏好或反應模式。

### 戰略文化的根源

從物質與理念之兩個層面來看，戰略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受到許多因素之影響，其根源可以求諸於包括地緣政治位置、歷史與經驗、國家政治結構、神話與象徵、國際關係與國際法、以及新軍事科技等。

首先，包括氣候與天然資源取得在內的地緣政治位置，是影響戰略文化之主要因素，也是理解國家決定戰略選項之重要關鍵。島國日本或英國的戰略選項偏好、取向、國防組織結構，必然不同於大陸國家中國或歐陸國家。而位於大國周邊、特別是國境相連的小國，其所採取的戰略選項，亦迥異於其他小國。芬蘭在冷戰期間採取親蘇聯的「芬蘭化」(*Finlandization*)政策，即是典型的事例。同樣地，以色列的地緣因素，足以說明其在軍事上選擇先發制人，以及建構核武戰力之戰略選項的動機。另外，在二戰期間，日本進軍東南亞，並孤注一擲地選擇發動太平洋戰爭之戰略選項，天然資源的取得與確保是重要原因。

其次，國家在誕生與發展過程中所經歷過的軍事歷史或經驗，以及包括記載傳統戰略思想之文獻或戰史，也是戰略文化的重要構成要素。中共於建政滿週年不久，選擇介入韓戰的戰略選項，歷經數十年的國共內戰而取得政權之經驗，扮

<sup>4</sup> 引用自莫大華著，『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臺北:時英出版社，2003年)，頁288。

<sup>5</sup> 同註2。

<sup>6</sup>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it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7.

演著重要的推手作用。而中共在內戰期間之用兵思維，或者是在建政後，分別與美蘇對立期間所採取的戰略選項，被認為是受到中國傳統戰略思想影響甚大。<sup>7</sup> 誠如林中斌所言：「中國的歷史孕育了獨特的戰略傳統。這一戰略傳統在當代中國仍繼續存在，並表現在其軍事領導人的言行中」。<sup>8</sup> 不過，林中斌也指出，在當代中共戰略的背後，雖然有延續中國傳統戰略之連續性，但也有來自新的體驗之間斷性，包括蘇聯軍事思想的引入，西方技術在總體上的影響等。<sup>9</sup> 因此，戰略文化之內涵不是永恆不變，既植根於歷史，也透過學習最近的體驗而成長與變遷。

第三，包括國防組織性質在內的國家政治結構。國家政治體制是成熟的歐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或者是一黨專政、軍事獨裁的非民主制度，將孕育出不同的戰略文化。由於前者對於國家政治領導人或軍事組織行使武力，具有議會監督或者是「文民控制」(*civilian control*)機制，比較不偏好動武之戰略選項。相對於此，缺乏民意監督或者是軍事領導人具有較高政治地位之後者，例如昭和時期之日本軍部，已經對國家戰略擁有主導力量，使得戰略文化發展傾向軍國主義，軍事行動成爲執行國家對外政策之優先選項。

第四，屬於文化全體一部分之神話與象徵，也是戰略文化的構成要素。在古代與近代日本，天皇是「萬世一系」的現人神，日本是天皇居住的神國，日本人對天皇無條件、無限度的忠誠。而且，誠如潘乃德(Ruth Benedict)所言，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敬不同於「希特勒萬歲」式的崇敬。因爲，對日本人而言，天皇是所有事物的源頭，「天皇是日本人民的象徵，宗教生活的中心，超乎宗教之上的崇拜對象」。<sup>10</sup> 近代的明治憲法，將此神話與象徵予以法制化，賦予天皇統率陸海軍大權，而軍部則擁有不受內閣與國會節制的「帷幄上奏」權限，讓近代日本成爲名符其實的軍事帝國。

第五，跨越國境的國際關係與國際法規範，以及新軍事科技的問世，決策者之戰略選項偏好自然會受影響。例如，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所締結共三次的日英同盟條約，以及在戰後與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所簽署的『限制海軍軍備條約』，都對其後的戰略文化發生深遠的影響，進而影響昭和時代的國防方針。而精密導引與資訊科技之長足進步，並被使用於軍事用途，改變未來的戰爭型態，也改變國家的戰略文化。

### 建構主義對戰略文化研究之影響

1980年代末期，由於國際政治學界兩大主流理論現實主義學派以及自由主義學派(*liberalism*)，對於冷戰期間國際政治的現象與變化，特別是冷戰結束後，遽然出現的新興國家發展走向，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分析理論架構，建構主義學

<sup>7</sup> 夏征難著，『毛澤東與中外軍事遺產』(中國:大連出版社，1997年)，第一章。

<sup>8</sup> 林中斌著，『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略武力』(臺北:學生書局，1999年)，頁50。

<sup>9</sup> 林中斌著，『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略武力』，頁40。

<sup>10</sup> 潘乃德(Ruth Benedict)著，黃道琳譯，『菊花與劍:日本的民族文化模式』(臺北:桂冠圖書，1991年)(原文: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頁28-29。

派乃以第三勢力的姿態崛起，與前二者並列成爲後冷戰時代國際政治學界三大代表性理論。換言之，建構主義學派乃是藉由批判既有的主流理論，並試圖提出另類思考的新興學派。

建構主義學者基於社會心理學者的社會互動與結構化觀點，認爲國際體系是社會建構，是行爲主體與外在結構相互建構而成。其基礎假設是，人類是社會動物，社會關係建構人，人則運用相互的行動與語言等資源，建構(族群與國際)社會，而社會規則則是兩者的連結。他們主張，理念(*ideas*)與結構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是國際關係的主要動能，強調規則與規範(*rules and norms*)、制度與文化的重要性。因爲，規則建構行爲主體(人)，行爲主體建構規則，而規則構成制度，制度構成社會。簡言之，人與社會是相互建構關係。<sup>11</sup>

建構主義學派旗手溫特(Alexander Wendt)，在其被視爲論述建構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指出，國際社會之無政府(*anarchy*)或自助(*self-help*)狀態，並非是國際社會結構自然形成的，而是國際社會上國家間互動所建構而成的結果。溫特認爲，光只是結構，是無法分辨出某兩國是敵或是友，無法預測彼此間是否相互承認主權，以及對方是屬於現狀維持派或者是企圖變更現狀。例如，同樣是美國鄰國的加拿大與古巴，卻分別採取完全不同的對美政策，因爲美軍對加拿大而言，是保障安全的力量，但是，對古巴而言，則是危害國防安全的威脅。加拿大與古巴之完全相反的感受，原因在於兩國擁有各自不同的國內規範與自我認同(*identity*)。<sup>12</sup>換言之，建構主義學派主張，國內規範與自我認同是決定甚麼是威脅，以及如何保障安全之依據，不管是軍事或非軍事，防衛規範與自我認同等價值體系，才是安全保障之最重要任務。

其次，李樹卡本(Thomas Risse-Kappen)針對在1940年代後半國內總生產總額(GNP)與英國相差無幾的蘇聯，爲何會成爲西方國家威脅之現象，做如下之說明。亦即，單純地力量強大，未必會構成威脅，還必須考慮到其意識型態與對外行動。美國總統杜魯門一直到1945年12月，依然視蘇聯爲友好國家。其後，蘇聯之所以成爲威脅，原因在於蘇聯軍隊入侵東歐，扶植共產主義政權，並開始展開鎮壓反對勢力。由於此等行動違反西方國家之國內規範，杜魯門才會將蘇聯的定位由友好國家轉變爲敵對威脅。因爲東歐國家遭到「蘇聯化」、「赤化」，在西方民主國家身分之認同上，被定位爲「非我族類」之威脅。此爲北約組織(NATO)與華沙公約組織(WTO)，在歐洲大陸對立五十年之規範與文化背景。<sup>13</sup>

受到建構主義影響，戰略文化研究在1990年代，出現約翰史東所稱的「第三世代」，企圖從理論面之發展，讓戰略文化研究更趨於嚴謹與精準。約翰史東以探討中國戰略文化的存在及其性格、戰略文化與對外敵之武力行使間是否具有因

<sup>11</sup> 莫大華著，『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頁 95-98。

<sup>12</sup>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2 (Spring,1992), pp.391-425.

<sup>13</sup> 參閱:土山實男『安全保障の國際政治学: 焦りと誇り』(東京: 有斐閣、2004年)、321-322 ページ。

果關係之『文化現實主義:中國歷史之戰略文化與大戰略』<sup>14</sup>，則是其中之代表性著作。此外，柏格(Thomas Berger)在以西德與日本為對象之戰略文化研究著作中，探討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德日兩國社會所形成的「反軍國主義的政治-軍事文化」(*Political-Military Cultures of Antimilitarism*)，透過社會化機制影響德日兩國戰後安保政策走向。<sup>15</sup>前者具有建構戰略文化研究理論之企圖，而後者則是以個案研究的途徑，探討特定國家之戰略文化。

## 參、近代日本傳統戰略文化

誠如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言，從文化以及文化的觀點來看，日本是個孤立的國家。其他所有的主要文明，都存在一個以上的國家，惟獨日本文明與文化，只存在日本一個國家之內。明治維新以降，日本雖然透過「脫亞入歐」途徑，實現「殖產興業」、「富國強兵」、以及「文明開化」等三大戰略目標。但是，無可置疑的是，日本人的基本價值觀、生活方式、人際關係、行動規範等，卻依然維持著特異的日本文明，而不是西歐文明。<sup>16</sup>

潘乃德於 1944 年 6 月，受美國政府之命，從文化人類學家的觀點研究日本，提供美國政府制定對日作戰策略之參考。潘乃德的研究報告，於 1946 年以『菊花與劍』為題出版，成為戰後日本研究者必讀的經典作品。潘乃德從文化研究的角度，細膩地刻劃出日本的民族文化模式，連日本人都感到讚嘆。潘乃德所描繪出的日本文化，其中包含有戰略文化因素。

本文認為，日本軍事帝國瓦解前，影響近代日本傳統戰略文化發展與變遷的因素，除了第二節所述普遍性因素之外，還包括有以下日本獨特的文化、歷史、宗教等因素在內。

### 「萬世一系」的天皇

日本的天皇體制國體，為日本有史以來不變的政治原則。自西元 645 年引進隋唐制度，實行「大化革新」後，天皇成為國家最高領袖，並親理國家大政。不過，自 9 世紀末以降，天皇之統治大權旁落。一直到 1867 年 10 月，德川幕府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奉還大政，明治天皇發佈「王政復古」宣言、推動明治維新後，始再度確立由天皇總攬國家大政之中央集權制度。<sup>17</sup>

<sup>14</sup>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sup>15</sup> 柏格表明，其所使用之「政治-軍事文化」，類似戰略文化之概念。Thomas Berger, *Cultures of Antimilitarism: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9, p.15.

<sup>16</sup> サミュエル・ハンチントン、鈴木主税訳『文明の衝突と 21 世紀の日本』(東京：集英社、2004 年)、45-48 ページ。

<sup>17</sup> 陳水逢著，『日本近代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第二章；原口清著，李永熾譯，『日

在藤原氏等「關白」攝政，以及幕府將軍統治等時期，天皇雖然大權旁落，但由於天皇是天照大神(太陽神)後裔的神話深植人心，以致統治者仍然必須依賴天皇名義，以維持其政權之合法性。在傳統的神道教信仰與教化下，天皇被神格化，讓日本人相信天皇是天上神明在人世間代表的現人神，擁有神明的權威與慈悲。明治政府於 1882 年，奉神道教為國教，稱為「國家神道」，透過祭祀活動之潛移默化，強化天皇是溝通人與神之現人神形象，鼓吹日本是天照大神庇護下的神國，灌輸日本臣民之忠君愛國思想，成為日本軍事帝國對外侵略之道具。

其次，明治維新政府為實現「王政復古」，於 1968 年 4 月 6 日，由明治天皇親率文武百官祭告天地神祇，宣讀「五條誓文」，要求「上下一心，共展經綸」、「破除舊來陋習，一切基諸天地之公道」，並且將「廣求智識於世界，大振皇基」。其後，明治天皇對民眾發表「宸翰」(親筆信)表明:將「親經營四方，安撫汝億兆，遂開拓萬里之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欲置天下於富兵之安」。<sup>18</sup>

此外，明治政府更透過憲法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第一條)、「天皇是神聖不可侵」(第三條)、「天皇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第四條)、「天皇統率陸海軍」(第十一條)，<sup>19</sup>將天皇是萬世一系的神話予以法制化，並且重新樹立天皇實權統治權威，確立近代天皇制。因為「天皇是神聖不可侵」，所以對內閣的任何行為不負責任，天皇的任務不是擔任國家的責任元首，而是代表日本臣民統一的最高象徵。<sup>20</sup>

由於自古代以來的文化傳承，以及明治政府的刻意鼓吹，讓天皇成為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信仰的重心。潘乃德所訪問的許多日軍戰俘表示:日本人「只要在天皇發令之下，縱使單憑竹槍，也會毫無顧慮地奮戰；但只要天皇一聲令下，他們會同樣迅速的停戰」、「即令是(最好戰、最具侵略性的)滿洲的關東軍，也會放下武器」、「只有他的話能使日本人承認戰敗而安於重建工作」。<sup>21</sup>這些戰俘的表白，事後獲得事實的證明。戰後第二任首相幣原喜重郎於 1945 年 10 月組閣時的談話，對於天皇與日本人的關係有更深刻的表明，亦即:「新日本的政府，具有尊重人民意志的民主型態....我國自古以來，天皇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這是明治天皇所制定憲法的精神，我所提及的民主政治可以看作是這種精神的顯現」。<sup>22</sup>由此不難看出，近代日本帝國臣民對天皇無條件、無限制的忠誠，成為軍國主義者以天皇之名，發動侵略戰爭之強有力的動員令。

在戰前曾擔任美國駐日大使十年之國務次卿格魯(Joseph C. Grew)，在草擬波茨坦宣言時，即基於以下理由，主張保留天皇制:(1)確信天皇是和平與秩序的象徵；(2)能夠使日本結束戰爭的人物只有天皇；(3)若能讓天皇發佈命令，現存於

---

本近代國家之形成』(臺北:水牛出版社，1986 年)，第一章。

<sup>18</sup> 陳水逢著，『日本近代史』，頁 44-45。

<sup>19</sup> 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全文，參閱:日本国憲法の誕生、国立国会図書館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ndl.go.jp/constitution/etc/i02.html>、2010 年 5 月 12 日登入。

<sup>20</sup> 潘乃德著，『菊花與劍』，頁 115。

<sup>21</sup> 潘乃德著，『菊花與劍』，頁 29。

<sup>22</sup> 潘乃德著，『菊花與劍』，頁 275-276。



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約 300 萬日軍即可放下武器，減少數十萬美軍之犧牲；(4) 若廢除天皇制，將招致日本人之仇恨心，即使佔領日本也會發生混亂。格魯的觀點被杜魯門政府採納，確定盟軍佔領日本之統治型態為：透過天皇與日本政府之間接統治。1946 年元旦，昭和天皇走下神壇，發表「人間宣言」詔書，向日本國民表明天皇是人不是神，並走入人群，激勵日本國民努力工作重建家園。<sup>23</sup>

### 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原是幕府時代武士階級所奉行不悖的一套道德規範，在經歷長達七百多年的歷史流傳後，逐漸擴散成為日本人的美德。武士道精神源自於日本固有的神道教、儒家與佛教思想而形成。它並非明文規定，而是包括口語相傳的要訣，以及著名戰士或學者之格言。<sup>24</sup>

神道教要求武士必須忠於主君，尊敬祖先，以及對父母的孝道。作為神道教信徒的武士，必須遵守日本精神生活的兩大特色—愛國與忠誠。曾經擔任國際聯盟副秘書長之日本教育家新渡戶稻造指出，神道是整個日本國家的動力和民族情感的寄託，並且把對於主君的忠誠與對國家的愛，融入武士道之中。當忠孝發生衝突時，武士道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忠誠，武士的母親亦會鼓勵其子女為主君犧牲。因此，新渡戶稻造同意「在中國儒家思想的倫理裡，服從父母親是人類最基本的責任，而在日本則是應該優先對皇室表示效忠」之見解。<sup>25</sup>其次，佛教特別是禪宗，則賦予武士以恬靜地聽憑命運的內涵，默默接受無可避免的結果；當面臨危險或災難，也要堅忍沉著；同時視生命如鴻毛，為武士道提供以死盡忠的修行體系。此外，儒家孔孟的教誨與王陽明學說，對武士道影響甚深。孔子提倡的五倫，在儒家思想傳入日本之前，即已是日本社會的道德原則。而孔子所強調的冷靜、仁慈，以及各種放諸四海皆準的政治倫理規範，對於正是社會統治階層的武士也特別適用。<sup>26</sup>

新渡戶稻造認為，武士道有外在的與內在的兩個部分教誨，容易理解的外在教誨，引領社會走向安寧與幸福，而艱澀難懂的內在教誨，則是武士實踐道德的準繩。而武士道則透過各種方式，從發源的階層向下滲透，在庶民當中發酵擴散，提供所有人的道德標準。武士道最初是統治精英階層的榮耀，其後才逐漸擴大成為眾人的渴望與啟發。新渡戶稻造強調，這種「大和魂」，也就是日本的靈魂，已經成為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徵。<sup>27</sup>總而言之，新渡戶稻造所闡述的武士道精神，實際上是明治時代日本庶民之精神構造。

1882 年，明治天皇頒佈「軍人敕諭」，強調自古以來，歷代天皇即是軍隊的統帥，渠能否保衛國家、報答歷代天皇之恩德，端視軍人是否盡忠職守。為此，「敕諭」提出五項現代武士（軍人）之道德精神守則，亦即：「盡忠義，守本分」、

<sup>23</sup> 閻德學，『武士之路：日本戰略文化及軍事走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1。

<sup>24</sup> 新渡戶稻造著，吳容宸譯，『武士道：影響日本最深的力量』（臺北：先覺出版社，2009 年），頁 9。

<sup>25</sup> 新渡戶稻造著，『武士道』，頁 19、96、99。

<sup>26</sup> 新渡戶稻造著，『武士道』，頁 20-21。

<sup>27</sup> 新渡戶稻造著，『武士道』，頁 176-179。



「端正禮儀，上下有節」、「崇尚勇武，盡忠職守」、「講信義，重然諾」、「樸素無奢」，並稱此五項守則為「天地之公道，人倫之常經」，要求軍人必須誠心履行，以效忠代表國家之天皇。<sup>28</sup>「軍人勅諭」被視為必須絕對服從的神諭，以及軍隊精神的核心，軍人必須逐字背誦，每天早晨必須默想十分鐘。<sup>29</sup>1890年，明治天皇頒布「教育敕語」，要求全國臣民要克盡忠孝、義勇奉公，輔弼天壤無窮之皇運，<sup>30</sup>並且透過將學校、家庭、社會等結合一起的教育，讓武士道精神成為日本國民之道德規範。

明治政府在廢除武士階層之後，將武士道精神包裝成為「軍人勅諭」與「教育敕語」，用以彰顯天皇在國家法統上以及道德精神上之權威，將封建時代武士與庶民分別效忠各自蕃主之多元化忠誠，轉化為效忠天皇之一元化忠誠。<sup>31</sup>同時，在明治天皇「遂開拓萬里之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之宏願下，明治政府提出從歐美帝國主義者手中解放亞洲是大和民族的歷史使命之口號，意圖建立以日本為霸主的「東亞共榮圈」，武士道精神即成為動員國民支持「大東亞戰爭」之精神動力。

#### 「各守本位」的集體與階層意識

與歐美人相比較，日本人在行為或思考模式上，具有濃厚的集體歸屬意識，隨時意識到自己是集體的一部份。<sup>32</sup>由於擔心自己被排斥在集體之外，日本人在行為上，會避免突出或與眾不同，自覺地把自己納入集體中。由於此等意識作祟，日本人為配合集體的共同行動而失去自我。對於日本人之集體意識，有位西方評論家比喻稱：日本人就像池子中的一群小魚，秩序井然地朝著同一個方向游動，當有一塊石子投入水中，攪動了魚群的隊列時，魚群雖會改變游動方向，但依然秩序井然地游動。日本人集體意識源自於傳統的稻作農業，以及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的家族主義與武士對蕃主的歸屬意識。<sup>33</sup>

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優先考慮的，不是個人的事，而是個人所隸屬的家族與其他集體，例如，幕府時代的蕃閥，以及現代社會的公司、政黨的派閥。因為，個人是集體的一部份，有集體關係才能彰顯個人之存在。基於此，日本人才會具有濃烈的集體依賴傾向。在日本出生、曾經擔任美國駐日大使的哈佛大學教授雷夏瓦(Edwin O. Reischauer)認為，國際社會當中，似乎不存在像日本人那樣，在「我們日本人」與「外國人」之間明確地畫線區別的國家。日本人的集體意識比其他國家的國民強烈，因此，「與他人不同」的感覺也就強烈。雷夏瓦強調，日

<sup>28</sup> 「軍人勅諭」日語原文，參閱以下網頁：<http://www.asahi-net.or.jp/~uu3s-situ/00/Gunzin.tyokuyu.html>。

<sup>29</sup> 潘乃德著，《菊花與劍》，頁191。

<sup>30</sup> 「教育敕語」日語原文，參閱以下網頁：<http://www.cc.matsuyama-u.ac.jp/~tamura/kyouikutyokugo.htm>。

<sup>31</sup> 王英英、許清江著，《冷眼向洋話東瀛——兼論新世紀中日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頁106。

<sup>32</sup> 不過，有日本學者主張，認為日本人具有集體意識，乃是錯誤的認知，參閱：高野陽太郎『「集團主義」という錯覚：日本人論の思い違いとその由来』（東京：新曜社，2008年）。

<sup>33</sup> 閻德學，《武士之路》，頁12。

本人與歐美人最大的差異，在於日本人把家族以外的集體關係置於家族關係之上。<sup>34</sup>

其次，「和」的精神讓日本人本能地以集體一致的原則行動。北海道大學教授山岸俊男表示：日本人在集體當中，即使要犧牲自己，也會相互體諒採取協調的行動，並不是因為出自於自己喜歡、自發性地希望集體獲得利益，而是因為日本社會存在著相互監視與約束的架構，阻止個人採取違反集體利益之行動。<sup>35</sup> 維護與追求集體的利益，成為集體活動的中心目標，實現此等目標成為個人的存在價值，凡是與此背道而馳者，將會受到集體的壓制、甚至排擠，導致個人在集體中無法立足。山岸俊男以社會心理學的實驗結果指出，人為地去除集體其他成員對自己觀感之憂慮，以及相互監視與制裁機制後發現，美國人比日本人更會為集體的共同目標採取合作的行動。<sup>36</sup> 換言之，來自於集體有形或無形的壓力，乃是促使日本人表現出集體意識的動能。

而在日本社會的集體，則呈現出金字塔型的主從階層結構。日本東京大學教授中根千枝認為，日本的社會結構是一種「縱向社會」(タテ社会)，不同於中國、印度或者是歐美的「橫向社會」(ヨコ社会)。處於「縱向社會」的日本人，重視人際間的上下關係，例如親子關係、主從關係、師生關係、上司部屬關係等。不過，就家族內部關係而言，媳婦之重要性，大於各立門戶之兄弟或出嫁之姊妹。<sup>37</sup> 在上下或主從階層關係之社會結構中，權威就成為一種強力的接合劑。此種權威源自於彼此間自然的情感（親情與人情義理），以及居上位者之身分或地位，服從權威是日本社會運行的基礎，此種意識是日本人長期處於「縱向社會」生活中所形成的恆常思維方式。<sup>38</sup>

潘乃德指出，在人際關係與個人國家關係的觀念中，日本人對階層制度的信賴乃是核心所在；日本人慣於透過他們的階層觀念來看國際關係問題，並且自視為處於國際階層體系的頂端。潘乃德引用日本外交文書，證明日本人對階層制度的重視。例如，1940年日、德、義三國同盟條約前言稱：三國政府確信，「唯有在世界各國各守本位的先決條件下，才能實現任何持久的和平」；而盟約簽訂時，明治天皇所頒布的詔書亦稱：「萬邦各守其位，兆民安居樂業，乃曠古大業」；此外，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於日本偷襲珍珠港當天，向美國遞交的最後通牒中指出：「使萬邦都能各守其位，...乃是日本帝國一貫的政策...當前局勢與上述日本基本國策全然違背，故敝國政府無法容忍其繼續存在」。<sup>39</sup>

由此可知，讓世界各國「各守本位」，乃是明治政府對外政策追求的目標，日本不惜為此目標而發動戰爭。他們認為，歐美帝國主義在日本崛起於東亞後，

<sup>34</sup> エドウィン・O・ライシャワー『ザ・ジャパニーズ』（東京：文芸春秋社、1979年）。

<sup>35</sup> 山岸俊男『心でつかちな日本人：集団主義文化という幻想』（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2年）、37ページ。

<sup>36</sup> 山岸俊男『心でつかちな日本人』、37-39ページ。

<sup>37</sup> 中根千枝『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単一社会の理論』（東京：講談社、1967年）。

<sup>38</sup> 閻德學、『武士之路』，頁13-14。

<sup>39</sup> 潘乃德、『菊花與劍』，頁38-39。

即應退出亞洲；當事與願違時，日本為使萬邦都能「各守本位」，只好發動「大東亞戰爭」，驅逐歐美帝國主義、解放亞洲，建構「東亞共榮圈」。同時，自認居於東亞國際體系頂端之日本認為，東亞其他國家雖然必須忍受日軍進駐、供應戰略資源，甚至主權行使會受到限制，然而卻能免於繼續受到歐美帝國主義之壓迫與剝削，並獲得日本所提供的安全保障。此等階層制度下的「各守本位」觀念，提供日本人否定侵略戰爭責任之立論根據。另一方面，也由於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各守本位」階層意識，才讓美國的日本佔領政策執行無礙，讓日本在戰後 60 年，仍然能夠接受「美國為主、日本為從」的美日安保體制。

## 肆、戰後反軍國主義與安保政策

戰後日本戰略文化的構成要素，除了來自古代日本以來的歷史傳統，以及明治維新以降的「歐化」體驗之外，對外武力侵略導致幾乎亡國滅種之戰敗教訓，以及美國占領期間、結束佔領後之日美安保體制下的體驗，可能成為影響戰後日本領導階層的安保戰略規劃與決策之變數。

二戰結束後，日本國內社會在「盟軍總部」(GHQ) 強力主導下，建構出以「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為指導理念之「戰後體制」。在此一體制下，日本社會孕育出「非軍國主義化」、「和平主義」之共同規則與規範，並且在此一社會規範制約下，發展出「專守防衛」原則，以及做出「日本擁有集體自衛權，但不能行使」之自我限制。

### 反軍國主義文化之形成與「再軍備」論爭

由於軍國主義勢力之鼓吹與煽動，日本人民被捲入支持「大東亞戰爭」的狂潮，導致幾乎亡國滅種。戰後多數的日本人認為，他們也是日本帝國政府，尤其是軍部領導階層發動對外戰爭之受害者。因此，廣大的日本人民認為，軍隊被視為天生就會惹麻煩，敵視人權與民主主義。日本民眾對於軍對之不信任，反映在戰後日本安保政策之討論。<sup>40</sup>知名的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指出，學者與知識份子基於未能阻止政府發動戰爭之悔恨，在戰後形成「悔恨共同體」，遂積極投入解構戰前的國家主義，以及建構戰後的國民主義，<sup>41</sup>在日本社會形成一股反軍國主義力量。

「非軍事化」與「民主化」之日本佔領政策，是美國剷除日本軍國主義滋長的土壤，主導重建戰後亞洲新秩序的核心要素。在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sup>40</sup> Thomas U. Berger, From Sword to Chrysanthemum: Japan's Culture of Anti-militar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 No.4 (Spring 1993), pp.119-150.

<sup>41</sup> 王文岳，「國體的辯證：近代日本國民認同變遷的政治經濟基礎」，收錄於：蔡增家編，『日本研究與研究日本—從方法到知識』(臺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08年)，頁165。

主導制定下，於 1947 年 5 月 3 日開始實施的日本國憲法，則是此一占領政策之指導大綱。憲法前言表明，確立國民主權、堅持和平主義，以避免再度因為政府的行為而引發戰爭。為此，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誠懇地渴望以正義與秩序為基調的國際和平，永久放棄為國權而發動之戰爭，以及以武力威嚇或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紛爭手段之戰爭」、「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有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之交戰權」。<sup>42</sup>此部象徵和平意義的憲法之實施，提供戰後日本和平主義與反軍國主義發展之良好環境。

不過，美國因為韓戰的爆發，轉向要求日本「再軍備」之舉，被和平主義者視為「背叛」，並透過反「再軍備」而助長反軍國主義之發展。1950 年 7 月 8 日，麥克阿瑟為填補駐日美軍投入朝鮮戰場所出現的防衛空缺，決定要求日本政府創設足以因應小規模侵略、擁有必要最小程度裝備之軍事組織，啟動日本「再軍備」引擎。<sup>43</sup>首相吉田茂雖然同意創設警察預備隊，但是卻以不存在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危險、不符合國民的希望、周邊國家懷疑軍國主義復活、以及妨礙經濟復興等理由，拒絕「再軍備」。1951 年初，吉田在美國壓力下作出妥協，採取在日美安保體制架構下，逐步實施的有限度「再軍備」，但仍然置重心於經濟發展，形成所謂的「輕武裝、重經濟」吉田路線，主導戰後日本對外政策數十年。<sup>44</sup>

美國對日政策之轉變，導致日本國內擔憂軍國主義復活之左派革新勢力，與包括自由派知識份子在內的戰後和平主義者結合，擴大反對「再軍備」勢力。<sup>45</sup>對此，吉田內閣將反對「再軍備」勢力視為共產主義者或其同路人，透過制定破壞活動防止法等手段加以鎮壓，激化國內左右勢力之對立。<sup>46</sup>其次，蘆田均、鳩山一郎等反對吉田茂之保守派重量級政治人物，因韓戰爆發而憂慮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到來，遂積極主張「再軍備」。由於積極「再軍備」論，被戰前右翼勢力與舊軍人利用作為重返政治舞台之工具，引起反軍國主義大眾的強烈反彈。<sup>47</sup>

1952 年 10 月舉行的總選舉，「再軍備」問題成為選戰焦點。左派社會黨候選人將「再軍備」與戰爭相連結，訴求「不要再度將丈夫、兒子送上戰場」，獲得年輕人與婦女選民之極大迴響，迫使「再軍備」積極論者調整選戰策略，改以強化自衛力作為訴求。選舉結果，左派社會黨議席大幅成長，顯示出反對「再軍備」議題獲得選民支持。半年後吉田內閣解散眾議院改選，「再軍備」依然是選戰議題焦點，左派社會黨議席再度大躍進，成為第二大黨。<sup>48</sup>「再軍備」積極論者在經歷兩次選戰挫折後，修正路線並向溫和保守派的吉田路線靠攏，雙方於 1955 年合組自由民主黨，與社會黨形成朝野兩極對抗的「保格伯仲」構圖。而

<sup>42</sup> 日語全文，參閱以下網頁：<http://constitution.at.infoseek.co.jp/>。

<sup>43</sup> 大嶽秀夫『再軍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戦後日本の防衛観』（東京：講談社、2005 年）、50-60 ページ。

<sup>44</sup> 大嶽秀夫『再軍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80-94 ページ。

<sup>45</sup> 添谷芳秀『日本の「ミドルパワー」外交—戦後日本の選択と構想』（東京：ちくま新書、2005 年）、49 ページ。

<sup>46</sup> 大嶽秀夫『再軍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147-148 ページ。

<sup>47</sup> 大嶽秀夫『再軍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154-202 ページ。

<sup>48</sup> 大嶽秀夫『再軍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202-210 ページ。

此一國內政治構圖，形同宣告日本社會反軍國主義之戰略文化已然形成，並且對日本安保政策形成一股制約力量。

### 日美安保體制下的「專守防衛」原則

1951年9月8日，日本與美國締結『日美安保條約』，並且在1960年1月19日重新修訂適用迄今。在以日美安保體制為基調的吉田路線引導下，日本在1960年代進入經濟高度成長時期，並且邁向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方向發展。<sup>49</sup>但是，日本並沒有如現實主義學派觀點之預測，憑仗其雄厚的經濟實力與領先世界的高科技為背景而擴張軍備，進一步地追求區域霸權。日本之所以未發展成為軍事大國，除了要歸因於日美安保體制扮演抑制日本建構超出自衛所需國防武力之「瓶塞」角色外，<sup>50</sup>反軍國主義戰略文化應該是最大的制約因素，具體表現在多數民意支持的憲法第九條。

從冷戰期間迄今，在憲法第九條架構下，日本政府在安保政策上始終維持「專守防衛」原則。1955年7月，防衛廳長官杉原荒太在眾議院答詢時，解釋自衛隊之任務是「専ら日本を守る防衛」（專為防衛日本），並以其中4個漢字造出「專守防衛」新用語。根據日本杏林大學教授宝珠山昇指出：「在戰敗後之虛脫狀態當中，國內瀰漫著強烈的反戰、反軍人情緒，以及非武裝中立之幻想，而國際社會亦以嚴厲的態度，監視著日本軍國主義之復活。在此等內外環境下，日本只能採取被動的戰略守勢，因此才會出現『專守防衛』原則」。<sup>51</sup>1981年3月19日，防衛廳長官大村讓治在參議院答詢時，對「專守防衛」原則作如下之定義：「依據憲法精神所採取的被動性防衛戰略，在受到對方武力攻擊之際，才開始使用防衛力量，其使用態勢亦僅止於自衛所需之必要最小程度，而所保有之防衛力量，亦只限於自衛所需之必要最小程度」<sup>52</sup>。

實際上，日本政府依據憲法第九條精神，採取自我限制措施有以下幾項。<sup>53</sup>

- 第一， 只能擁有自衛所需之「必要最小限度」自衛戰力。至於其具體的限度，則由國會在審議年度預算時，依據當時的國際情勢以及軍事技術水準等條件加以判斷。但是，專為摧毀對方國土之攻擊性武器，則不被允許。例如，洲際彈道飛彈、長程戰略轟炸機、以及大型航空母艦等戰略武器。
- 第二， 行使自衛權之條件為：發生對日本急迫且不當之侵害時；已別無其他適當手段足以排除此一侵害；必要最小限度之武力行使。
- 第三， 能夠行使自衛權的範圍，只限定在日本領土、領海、領空。以行使武力

<sup>49</sup> 有關日本崛起之論述，參閱：Kenneth B.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New York: The Century Foundation, 2006)。

<sup>50</sup> 此即美國總統尼克森於1972年2月22日訪問北京，與中共總理周恩來舉行會談時，所提出的「瓶塞理論」概念，亦即，美日安保體制扮演著。傅建中編著，『季辛吉密錄』（臺北：時報文化，1999年），頁52-53。

<sup>51</sup> 林賢參，「蛻變中的日本防衛政策—北韓之飛彈威脅 VS. 日本之『先制攻擊』論」，『展望與探索』第4卷第8期(2006年8月)，頁93。

<sup>52</sup> 林賢參，「蛻變中的日本防衛政策」，頁94。

<sup>53</sup> 防衛庁編『平成16年版日本の防衛』（東京：国立印刷局、2004年）、79ページ。



為目的，派遣武裝部隊進入他國領域之「海外派兵」，則為憲法所禁止。第四，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依據國際法規定，任何主權國家都有權行使集體自衛權，但因此舉已超出自衛權行使範圍，不為憲法所允許。

其次，在佐藤榮作內閣時代，佐藤首相先後提出「武器輸出三原則」與「非核三原則」之自我設限。1967年4月21日，佐藤在國會表明，為彰顯日本和平國家之形象，禁止將武器出口到以下三種國家：共產國家、聯合國通過決議實施武器禁運國家、國際紛爭當事國或有出現紛爭之國家或區域。<sup>54</sup>此外，由於受到原子彈攻擊之慘痛經驗，戰後日本社會對核武極度敏感。1968年1月27日，佐藤在國會施政方針報告時，表明日本政府將堅持「非核三原則」，亦即「不開發、不運入、不持有」核武。同月30日，佐藤在國會答詢時，再度提出包括「非核三原則」在內的四項核政策，成為日本政府核政策之基礎。另外三項核政策為：<sup>55</sup>

第一，基於廢棄核武是日本國民的願望，日本政府將全力推動國際裁減核武軍備。

第二，面對核武威脅，日本仍將仰賴美國依據日美安保體制所提供的核武嚇阻力。

第三，將核能源和平使用視為最重要的國家政策，全力予以推動，並透過核能技術之開發，提高國民自信與國家威信。

另外，1976年11月5日，三木武夫內閣決議，將防衛預算設定在國民生產總額(GNP)1%以下。雖然中曾根康弘內閣所編列的1987年防衛預算，突破1%之上限(1.004%)，但也僅此一次，後繼內閣仍然維持在1%以下。

最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發生在1990年8月-1991年2月的波斯灣危機與戰爭，雖然事涉日本七成以上原油供應地之紛爭，以及美國強力要求提供作戰部隊之後勤支援。但由於此舉涉及集體自衛權行使之海外派兵，為日本憲法所不允許，結果日本政府僅能提供資金援助(130億美元)。

在危機初期，海部俊樹內閣為讓日本自衛隊能夠以聯合國和平協力隊名義派赴波斯灣，曾向國會提出「聯合國和平協力法」草案，但因為自衛隊可能被派赴戰鬥區域執勤問題，引發國會審查紛爭而成為廢案。1992年6月，日本政府雖然制定「國際和平協力法」，讓日本自衛隊可以參加聯合國主導的國際和平維持活動(PKO)。<sup>56</sup>但是，為貫徹憲法之和平主義，另外制定參加PKO五原則，並排除參加可能涉及武力行使之主體任務—監控停火，以及在停火區域執行巡邏、檢查武器運送等。其後，由於911事件發生，以及日本民眾普遍支持PKO活動，<sup>57</sup>日本國會通過「國際和平協力法」修正案，讓日本自衛隊得以參與主體任務。

<sup>54</sup> 西原正・土山實男共編『日米同盟Q & A 100』(東京：亜紀書房、1998年)、70ページ。

<sup>55</sup> 五百旗頭真編『戦後日本外交史』(東京：有斐閣、2006年)、137-138ページ。其後，佐藤榮作以「非核三原則」獲頒1974年諾貝爾和平獎。

<sup>56</sup> 信田智人『冷戦後の日本外交』(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年)、67-77ページ。

<sup>57</sup> 根據內閣府於2008年10月所實施的民調顯示，有超過7成的受訪者贊同參與PKO活動。「國際平和協力法に基づく日本の協力」、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

<http://www.mofa.go.jp/mofai/gaiko/pko/kvoryokuhou.html>、2010年5月25日アクセス。

## 伍、代結語

潘乃德在『菊花與劍』之開宗明義中，以兩種極端矛盾卻又兼容並蓄之性格，描述日本的民族性，亦即：「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sup>58</sup>最後，潘乃德結論指出：「日本的行為動機是隨情境而變的。如果情況允許，日本將在和平世界中求取位置；要不然，就在形成一個武裝陣營的世界中求取位置」。<sup>59</sup>經過本文論述可知，日本社會由戰前瀰漫著軍國主義浪潮，在經歷敗戰後，才幡然醒悟，並基於「共同悔恨感」，發展出反軍國主義與和平主義。此一歷史發展過程，證實潘乃德的預測。

鈕先鍾指出，每個民族在戰略思想上會有其特殊風格，基於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會有不同的戰略思想、不同的戰略行動。<sup>60</sup>透過潘乃德的研究可知，日本人是個極端機會主義者，精於權變之道，其手段可視環境而取捨。戰後，日本政府在反軍國主義風潮下，利用日美安保體制之庇護，務實地實施「輕武裝、重經濟」的吉田路線，將國防事務委由美國主導，其自身則傾全力發展經濟，並且迅速從戰後廢墟中站起來。日本從戰後復興到再度崛起的歷程中學習到，他們透過和平的經濟手段，已經實現戰前軍事手段所無法達成的目標，亦即實現經濟領域的「東亞共榮圈」。

在冷戰期間，日本政府為避免刺激反軍國主義文化，其所採取的安保政策，顯示出以下之特徵，亦即逐步建立必要且最小限度的自衛戰力、逐漸加強日美同盟合作、不參與多邊安全架構、以及海外派兵，以避免被捲入國際衝突。<sup>61</sup>但是，日本為迴避國際社會要求軍事貢獻之壓力，提出具有戰略援助意涵之「綜合安全保障」(*comprehensive security*)戰略，希望透過增加對外政府開發援助(ODA)經費之非軍事手段，以協助國際體系之穩定，間接地增加日本之安全。

不過，如同本文第二節所述，戰略文化既植根於歷史，也透過最近的體驗而成長與變遷。柏格認為，唯有發生外來重大事件或日本國內政治體系大幅轉變，受到反軍國主義影響的戰後日本安保政策方有可能出現大變革。<sup>62</sup>新世紀伊始，發生影響今後國際安全情勢發展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以及勢必改變東亞區域乃

---

<sup>58</sup> 潘乃德，『菊花與劍』，頁 2。

<sup>59</sup> 潘乃德，『菊花與劍』，頁 287。

<sup>60</sup>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臺北:麥田出版，1998 年)，頁 139。

<sup>61</sup> 克里斯多福·休斯(Christopher W. Hugues)著，李育慈譯，『日本安全議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8 年)(原文:Japan's Security Agenda: military,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頁 287。

<sup>62</sup> Thomas U. Berger，「聯盟政治與日本戰後的反軍國主義文化」，收錄於邁克爾葛林、派屈克柯羅寧編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美日聯盟：過去、現在與未來』(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 年)，第九章。



至於全球權力均衡之中共崛起，都是日本必須重新思考因應對策的外來重大事件或潛在的重大威脅。而種種跡象顯示，反軍國主義戰略文化之影響力有轉弱之趨勢。在此新情勢下，日本戰略文化的發展與變遷，以及安保政策之走向，將是今後的研究課題。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

- 林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略武力』（臺北：學生書局，1999年）。
- 林賢參，「蛻變中的日本防衛政策—北韓之飛彈威脅 VS. 日本之『先制攻擊』論」，『展望與探索』第4卷第8期(2006年8月)。
- 王英英、許清江，『冷眼向洋話東瀛—兼論新世紀中日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
- 王文岳，「國體的辯證：近代日本國民認同變遷的政治經濟基礎」，收錄於：蔡增家編，『日本研究與研究日本—從方法到知識』（臺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08年）。
- 莫大華，『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臺北：時英出版社，2003年）。
- 夏征難，『毛澤東與中外軍事遺產』（中國：大連出版社，1997年）。
- 潘乃德(Ruth Benedict)著，黃道琳譯，『菊花與劍：日本的民族文化模式』（臺北：桂冠圖書，1991年)(原文：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 克里斯多福·休斯(Christopher W. Hugues)著，李育慈譯，『日本安全議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8年)(原文：Japan's Security Agenda: military,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 邁克爾葛林、派屈克柯羅寧編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美日聯盟：過去、現在與未來』（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年）。
- 陳水逢，『日本近代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
- 原口清，李永熾譯，『日本近代國家之形成』（臺北：水牛出版社，1986年）。
- 閻德學，『武士之路：日本戰略文化及軍事走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 新渡戶稻造著，吳容宸譯，『武士道：影響日本最深的力量』（臺北：先覺出版社，2009年）。
- 傅建中編著，『季辛吉密錄』（臺北：時報文化，1999年）。
-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臺北：麥田出版，1998年）。

### 二、日文

- 五百旗頭真編『戰後日本外交史』（東京：有斐閣、2006年）。
- エドウィン・O・ライシャワー『ザ・ジャパニーズ』（東京：文芸春秋社、1979年）。

- 大嶽秀夫『再軍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戦後日本の防衛観』（東京：講談社、2005年）。
- 信田智人『冷戦後の日本外交』（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年）。
- 添谷芳秀『日本の「ミドルパワー」外交—戦後日本の選択と構想』（東京：ちくま新書、2005年）。
- サミュエル・ハンチントン、鈴木主税訳『文明の衝突と21世紀の日本』（東京：集英社、2004年）。
- 高野陽太郎『「集団主義」という錯覚：日本人論の思い違いとその由来』（東京：新曜社、2008年）。
- 土山實男『安全保障の国際政治学：焦りと誇り』（東京：有斐閣、2004年）。
- 中根千枝『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単一社会の理論』（東京：講談社、1967年）。
- 西原正・土山實男共編『日米同盟Q & A 100』（東京：亜紀書房、1998年）。
- 防衛庁編『平成16年版日本の防衛』（東京：国立印刷局、2004年）。
- 山岸俊男『心でっかちな日本人：集団主義文化という幻想』（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2002年）。

### 三、英文

-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2 (Spring,1992), pp.391-425.
-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it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7.
-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Colin S.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5, No.1 (Jan.1999).
- Jack L. Snyder,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The Rand Corporation (Sep. 1977).
- Jeffrey S. Lantis, Strategic Culture: From Clausewitz to Constructivism, *Strategic Insights*, Volume IV, Issue 10 (October 2005).
- Kenneth B.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New York: The Century Foundation, 2006).
- Thomas Berger, *Cultures of Antimilitarism: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 Thomas U. Berger, From Sword to Chrysanthemum: Japan’s Culture of Anti-militar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 No.4 (Spring 1993), pp.119-150.

